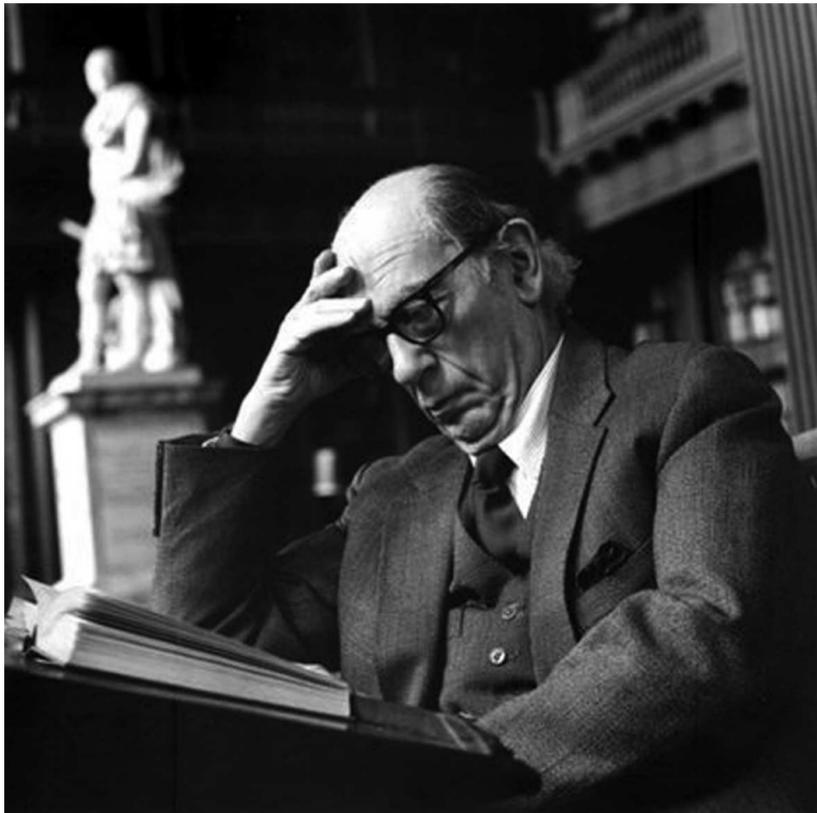




原典重读

# 理性是永远的坚持，最后的坚持

■ 王铭



以赛亚·伯林

以赛亚·伯林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观念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20世纪最杰出的自由思想家之一，因为对政治和道德理论做出贡献而闻名。

尽管去世已有20年，但伯林引发的关于自由、多元主义、民族主义等议题，仍然被持续研究、争论，他留下的著作一版再版，被人们反复阅读。

## 最接近真实的马克思

以赛亚·伯林的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1939)、《概念与范畴》(1958)、《自由四论》(1969)、《维柯与赫尔德》(1976)、《俄国思想家》(1978)、《反潮流》(1979)、《个人印象》(1980)、《人性的曲木》(1990)、《现实感》(1997)等。其中，关于马克思的学术传记是他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时年仅30岁，这部传记面世已有70多年，却至今仍被认为是传主马克思生平 and 思想最出色、最简明扼要的概述。

伯林在写作时，具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产生共鸣的本领，这一本领在《卡尔·马克思》中即有成熟的展现。他的这种高超的表述才能不仅让今天的读者在阅读时搞不清楚，文中哪些是他笔下主人公的观点，哪些是他自己的观点，即使在当年，有此困惑的人也不少。伯林的一个朋友在一封信里向她的朋友诉说：“伯林夫人(伯林的母亲)不得不承认，每个周末，伯林先生都会向她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她总会时不时打断他问道，‘这是马克思还是沙雅(即伯林)?’他也总是再三保证，‘不，这就是马克思，不是沙雅。’”

如此投入自己，会不会损失传记作者难能可贵的客观立场?事实是，《卡尔·马克思》被俄国历史学家理查德·查奎斯称为“客观清晰的一个典范”，在更广的范围内，这本书被认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没有先入为主，采用的是完全客观、毫无偏见的研究方法”，使“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和一个思想家，都变得明白易懂；而且不带有任何不适当的个人崇拜”。

伯林能够做到这样，或许原因在于他能够公平对待思想家及其思想，认为思想也有自己的生命，刻有其主人的个性印记。他认为，人们想要了解传主，真正地了解，一定是因为传主的思想，而不是婚姻或衣品。正如此书，伯林感兴趣的重点，是马克思写成《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他和传主展开“静默的对话”，并把对话的思想成果用生动的语言表述出来。

伯林笔下的马克思之所以真实，一部分原

因在于伯林没有回避存在于马克思身上的矛盾之处。比如，马克思公开声称不关心道德考量，但对工业革命早期人们习以为常的不公与残酷抱以明显的憎恨，等等。不仅如此，伯林还将自己此后的学术生涯都用在了思考与书写这些矛盾的起源、各种不同的世界观，以及与马克思同时代或后继时代的做着同样思考的人物。

## 想脱离而脱离不了的哲学

根据《概念与范畴》出版时的自序，将自己早年大部分哲学论文集结出版，并非伯林情愿为之。部分原因在于，他认为自己彼时已将哲学置于身后，转而研究观念史了。

但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这本书里，伯林又将自己多年以来潜心研究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往前推进了一步，并且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继续致力于解释、辩护和研究它。这个观点是，伯林认为存在多种善，否认“所有的好的事物都应该是彼此相容的”，也就是说，在生活中

或在建构某种社会秩序的时候，人们必定要为了善而牺牲另外一些善。伯林用它来解释各种政治、观念与文学纷争的事实。他将价值多元主义观念作为伦理学中的中间立场，确立于一元论和相对论之间。

这个观点，结合伯林更广为认知的关于两种自由的论述，产生了自由思想中的一个新学说——自由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

伯林对自由主义理论的论述影响深远，对他之后的关于自由和平等的关系讨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伯林认为，想要自己治理自己，或参与控制自己生活过程的欲望(积极自由)，可能和希求一个能够自由行动的范围的欲望(消极自由)，同样深刻。而从历史角度来看，前一种欲望，或许还发生得更早。但是，这两种欲望所希求的，不是同样的东西，实际上，它们的区别非常重大，以至于造成了今天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冲突。因为相信“消极的”自由概念的信徒，认为“积极的”自由概念，有时只不过是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而已；而“积极的”自由观念则认为，自由是去过一种已经规定的生活形式的自由。

译林出版社“伯林文集”(部分)

《卡尔·马克思》  
李寅译《概念与范畴》  
凌建娥译《观念的力量》  
胡自信 魏钊凌译

简而言之，“积极的自由”是“去做……的自由(LIBERTY TO…)”，“消极的自由”是“免于……的自由(LIBERTY FROM…)”。以此观之，“消极的自由”是不完美的，因为在“消极的自由”下，人们不能随心所欲，但在“积极的自由”下，最可能随心所欲的却是统治者。因此，在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分析中，伯林始终强调“消极自由”是更为真实的自由，“在我看来，‘多元主义’以及它所蕴涵的‘消极’自由，是比较真实的，比较合乎人性理想的主张。”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自由”二字的任何诠释，不论多么特殊，都必定包含最低限度的“消极”自由，即一个人必须拥有一个不受人干涉的领域。相比“消极的自由”，伯林指出，“积极的自由”更容易被误解、扭曲和滥用，以致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造成危险和灾难，因此我们需对“自由”做出更为恰当和特定的界定，限制其过于泛化和庞杂的理解。

伯林一直受牛津教育，后半生也一直任教、居住于牛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牛津哲学学术圈中的一员，甚至成为牛津大学的一个学术象征，常常“在牛津大学最大的一个讲堂做演讲，那里总是被渴望求知的大学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侃

## 有人情世故，也有科学元素

■ 吴晓东

“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主要撰写人徐彻为历史学出身，获吉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他长期任辽宁古籍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因工作性质需要，涉猎十分广泛。只是基于史学出身，他在中国晚清史方面着力较多，有《徐彻晚清史论》《慈禧大传》《光绪帝本传》等论著。

“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丛书的编撰，对徐彻先生来说，是结合了两个方面的成果。一方面是在他出版社工作期间，主编过多部词典，如《书法题词用语辞典》(1991)、《古诗景物描写类别辞典》(1991)、《现代汉语褒贬用法词典》(1992)、《东北人物大辞典》(1996)、《古诗情感描写类别辞典》(1999)等，具有丰富的词典编撰经验。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民间信仰很感兴趣，也颇有研究，先后著有《趣谈中国神仙》(2006)、《中国百神仙》(2008)和《中国俗神》(2010)等三部著作。这两方面的合力，促使了“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丛书的诞生。丛书序言中编者有这么一句话：“虽说可将本书当作字典、手册，但内容绝不像是字典、手册那么简单。”此言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徐彻在词典与民间信仰两方面研究的积累。

民间崇拜文化，实质乃民间信仰，范畴十分广博。“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丛书分为《道界百仙》《佛界百佛》《民间百神》和《冥界百鬼》四册，恰似一张巨网，涵盖了整个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且井然有序、条理分明。

信仰的提升，往往形成宗教，在民众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道观佛寺几乎遍布中国的千山万水，不仅在读万卷书时会时时“遭遇”百仙，就是行万里路也会常常“遇见”百佛。本套丛书析出《仙》《佛》两册，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道教百仙与佛教百佛，悉心研读这两小册，再游览道观佛寺定会少却许多茫然。天堂与地狱，分别为神与鬼的居所，也分别是善与恶的归属。丛书以《神》《鬼》两册切入，说尽了民间的神神鬼鬼，其实也道尽了民间的善善恶恶。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中国民间文化精髓尽显于道教之中。在汉代形成

道教之前，道的思想已然形成，可追溯到远古的天文历法。所谓道，最初的含义是指日月星辰的运行轨道，而道观则是观测这些运行轨道的地方，是观道之所，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台观测点。中国远古天文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齐头并进，在科学这条路上发展出了拥有二十四节气的方法，而在宗教信仰这条路上则衍生出了道教。正因为如此，道界里的神仙们多与天文息息相关，而《道界百仙》对此也多有呈现，创世神、天尊神、星宿神，皆可窥见其天象的蛛丝马迹。紫薇大帝、南极大帝、北斗星君、太白金星，在《道界百仙》里都有详尽解读。仙之别于神，乃是人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民间深信，通过修道，便可成仙不死，这种不死的理念源于月亮的圆缺盈亏，周而复始。月神发展而成的西王母，把持着不死之药，左右了中国民间成千上万年，此册游仙篇中的八仙便是修道成仙的代表，八仙的来龙去脉，文中皆有淋漓尽致般的解读。

佛教来自印度，汉朝时期开始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从那以后，一直是历朝历代主要的宗教，其摩崖石窟、楼阁庙宇几乎随处可见。寺庙经常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可是由于佛教分支众多，神灵庞杂，观众往往在游览时云里雾里，难以厘清错综复杂的关系，《佛界百佛》以名称为切入点，分佛陀部、菩萨部、观音部、诸天部、明王部、罗汉部和高僧部七章，分别选了一些影响深远的生灵加以阐释，比如佛陀部有如来、弥勒、阿弥陀、欢喜等十位佛陀，菩萨部有观音、文殊、普贤、地藏、药王、大势至、虚空等九位菩萨，将众多的佛、菩萨、罗汉等关系梳理得一清二楚，不仅对研究者十分有用，对普通游客也极有帮助。

宗教涵盖了民间最为主要的生灵，但依然有诸多神灵鬼怪游离于宗教之外。无论是宗教还是普通的信仰，都是对此宇宙世界的一种认知，且将宇宙划分为上中下三界，分别是神、人、鬼的栖身之处。总体上是神居于高高在上的天界，鬼幽居于阴暗的地域，但也不全是如此，《民间百神》分为信仰神、欢乐神、情感神、吉祥神、护卫神、行业神、自然神等七个部分，囊括了民间各方神灵，许多行业神、护卫神就不是高高在上，而是时时刻刻护佑在我们的身边。细读此册中的土地公婆、灶神床神，不仅

能理解它们的前世今生，同时也能感受到它们似乎就在我们的左右，如此亲切，倍感温暖。

鬼虽然令人恐惧，但似乎比神更接地气，鬼世界也更接近人间。《冥界百鬼》分为八章：鬼王部、鬼帅部、鬼吏部、鬼卒部、情鬼部、善鬼部、恶鬼部，活脱脱的一个人类社会另类的展现，不折不扣的人间映射。《冥界百鬼》前面的王、帅、吏、卒，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人类的社会分层与社会关系，而后部的情鬼、善鬼、恶鬼，更是人间爱恨情仇的呈现。

这套丛书的难处在于分类，但凡涉及分类，都会令人头疼，在民间崇拜文化上也是一样。这套丛书分为四部分：仙、佛、神、鬼，这难免会有一些重叠，但这是分类上的普遍现象。就道与佛来说，都有创世神。就道、佛、冥来说，都有冥界神。换言之，分类很难有完全的排他性，而往往具有重叠性。比如民间崇拜的神灵鬼怪，有的可以归入道，也可以归入冥，这时候就很难处理。这套丛书遇到这类情况时，往往同时收纳进两个不同的册子里，比如在《冥界百鬼》里可以看到地藏王的身影，同时在《佛界百佛》里也可以看见它的出现；在《道界百仙》里可以看到黄帝、女娲的形象，在《民间百神》里同样可以看到他们。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法。

人类对事物的认知，往往在多方面同时展现，科学与神话往往是平行发展，相伴相随，通过神话可以窥视到远古的科学。只要我们深入探讨某些神话的起源，就不难发现其背后所隐藏的科学的元素。很多神话是前人对自然界的认知，只是这些认知有的过了时，变成了不科学，就好像早期的人们认为太阳是围绕地球转，后来才发现并非如此。这类神话虽然失去了往日的光环，但它反映了人类的思想历程。透过故事的面面，依然可以找到一些自然的、科学的现象，探寻到中华文明的精髓。“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丛书的出版，恰具有这样的功效，可以让人们从信仰的层面来窥探远古先祖们对世界的认知，其中有人情世故，也有科学元素。

《中国民间崇拜文化丛书》(全4册)

徐彻等著  
上海三联书店

## 是路数，不是套路

■ 沈嘉禄

上海作家马尚龙不久前在浦东潍坊社区建了个工作室，向大家推广、解读上海方言及海派文化。有些新上海人，甚至包括老上海人，会讲“上海闲话”，却难以破译民间日常的一些俗语，而这些俗语是城市的密码，也是海派文化的表达方式之一。

在工作室的某次活动中，马尚龙跟大家讲到“路数”，有听众站起来问：“路数是不是就是套路?”马尚龙吃惊不小，他耐心向她解释两者的本质区别，但她听得似懂非懂，正如知名媒体人曹景行所说：“什么叫上海路数，老上海也未必讲得清爽，但一定晓得不懂上海路数就是‘拎不清’。”

于是，马尚龙决定写一本书来说“上海路数”，这就是《上海路数》的由来。与他以往出版的集子一样，这本随笔集的字里行间也流淌着真切的人文关怀，还有一贯的冷幽默，不动声色的针砭。关于上海、上海人、上海事，他总是格外地留意，许多人司空见惯或熟视无睹的现象，经他的观察与分析，就变得很值得拿到台面上来讨论。

马尚龙反对空洞的说教，他的草根性和务实态度体现在摆事实、讲道理。他在书中讲了一个小故事，有个出租车司机，某天从浦东载客去浦西海鸥饭店开会，车子进入越江隧道时那位客人突然发现自己忘带钱包，那时还没有支付宝和微信，没有钱包寸步难行。回家拿吧，隧道里不能掉头，时间也不允许。这位名叫孙宝清的司机，不仅不收钱把客人送到目的地，临走时还给了客人30元乘车券(一种古董级专项消费代币券)。孙师傅此举诠释了“古道热肠”这一成语在现代社会的积极应变。如果孙师傅到了目的地后板起面孔要求乘客付清车资，是不会受道德谴责的，但孙师傅的行为超越了服务规范要求，将一位衣冠楚楚的男人从尴尬境地中救出来，并蕴藉着助人为乐的愉悦与笃定。此举更值得评估的意义在于：对陌生人的信任与帮助意味着什么?

后来这位乘客联系到孙师傅，归还了车资，还改变了孙师傅的命运：原来他是刚到任的美国纽约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正要招聘一位司机。

读了这个故事，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某绸布庄老板吩咐小伙计给大户人家送一段绸布，小伙计来到主顾家，对方接了货，看他跑得满头大汗，就让他坐下歇口气，喝碗冰冻绿豆汤。小伙计这才发现原来这家老太太在做七十大寿，于是小伙计硬将货款退回去；权

侃而谈，不用笔记，“妙趣横生地介绍欧洲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的全貌，声音响彻讲堂”。然而，伯林很少撰写大部头专著来阐发他的想法，他写得更多的是一些长篇文章，由此而见《概念与范畴》的珍贵。虽然伯林想脱离哲学，但今天的我们还是能够从这本书收录的前后期文章中，辨识出伯林学术生涯关键的连续性，找寻到伯林之所以成为伯林的蛛丝马迹。哲学是伯林想脱离而脱离不了的关系。

## 观念是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

伯林相信观念是有力量的，观念，至少某些观念，是“发自心灵的物质”，而非只是头脑的产物。1958年，他在发表《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提到，“100多年前，德国诗人海涅警告法国人，不要低估观念的力量；教授的平静书斋里生长起来的哲学观念，能够摧毁一种文明。”

《观念的力量》收集了伯林一些短小精悍而又通俗易懂的文章，是一本伯林用观念的演变解读历史暗流的书。

文集的前两篇文章《我的学术之路》和《哲学的目的》，向我们展现了伯林笔下的观念发展历程，以及他对于哲学的观点和态度，两者是相互关联的。在思考“哲学的目的”时，伯林没有直接以概念分析的方式去描述分析哲学，而是借助哲学尝试解决的问题来思考它。在他举出的哲学问题中，提到了“所有的人真的都是兄弟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弄清楚“兄弟”的意义是不够的，它还需要情感。在“我的学术之路”中，可以看到伯林将关注点从意义转向了情感，当然，即便在他成为观念史学家之后，意义也并未从他的视野里消失。

伯林认为，观念获取力量，并不仅仅甚至并不主要依靠它们的意义，而是依靠它们与情感和其他联想的连接。观念的力量是由意义和情感构成的矢量，他关注观念的力量，坚定地相信人们会在它的影响下行动和反应，并认为观念的力量主要来源于政治逆境之中，由此就能解释伯林终生研究俄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痴迷。

今天重读伯林文集，重温这些既坚持信念又自我怀疑的文字，可以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思想生活。伯林曾于1972年和1978年写下两篇论民族主义的文章，这两篇文章都非常有名，曾引发大量讨论，但在那两篇文章之前，伯林还曾写下一篇较短的文章。文章末尾，他这样写道：

“如果人类活得足够长，也许能够看到连民族主义也显得荒谬和缥缈的那一天。但如果这一天真的到来，我们应该去理解民族主义而非轻视它；因为凡是不被理解的，都难以控制；是民族主义主宰着人类，而非人类主宰着民族主义。我们的任务是弄清楚这种无比强大却并非生来异样的现象源自哪里，它又如何变得病态失控，并为其寻找自我抒发的有效途径；既不要给它贴上无可容忍的非理性标签，也不要利用它达成我们自己的目的或者沉湎其中。”

这篇文集被收录在《观念的力量》的最后，仿佛告诉我们，理性是永远的坚持、最后的坚持，而这，正是重读的意义。

当我给老寿星送的一份薄礼吧。

这家主人很欣赏这个小伙计知书达礼，数天后就借给他一笔本钱，鼓励他创业，于是小伙计就在八仙桥开出一家绸布店，名叫宝大祥。

孙师傅和那个小伙计在做出决定的那一刻，并不晓得后面会怎样，他们只是以上海人通行的路数来“解题”，觉得自己唯有这样做才是恰当的。这种路数，就是上海人日积月累而成的、被上海人守护与践行的公序良俗。一座城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公序良俗，不会从天而降下来，而是最大多数人对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适应，对族群繁衍与强盛的前瞻性选择，每一条规则都凝聚了无数的教训与经验。公序良俗是法律的基础与依据，也应该是一种软实力。

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从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里，接纳了至少400万移民，占上海总人口的85%。他们来自五湖四海，阶层、语言、风俗等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这个目标是什么?是生存，是发展，也可以说是发财致富。他们进入老城厢，进入租界，沿着越界筑路的方向延展，最迫切的一件事就是学说上海话，熟悉上海规则，懂得上海路数。

外来移民初来乍到，不得不抱团取暖，借了会所、公馆的乡党与族群之力安顿下来，东张西望。上海的会馆、公所累计多达248座，它们与外资企业一样，都是异质文明进入上海的基地。外来移民将本土文化中合情合理、行之有效的某些规则和惯例，与上海本土文化兼容重组，成为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在这样的整合中，很难说何种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上海路数，肯定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它强调的不是个人的权威，而是制度的权威、法律的权威、秩序与规则的权威。契约精神与伦理道德，构成了上海路数这枚硬币的两面。

所以，路数不是套路，套路是骗局、陷阱、阴谋，我们要的是路数，才对套路说不。

改革开放后，上海接纳的外来移民总数超过此前100多年的总和，上海的城市文化由此变得更加多元、丰富、开放，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严明的秩序，上海路数的内涵也在不断充实。《上海路数》的出版，其实也是对上海路数的一次洗牌。

《上海路数》

马尚龙著  
文汇出版社